

# 新时代职业道德建设的逻辑理路与多维审视

邢国忠 伊笑莹

(北京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北京 100875)

**[摘要]** 当前人工智能技术飞速发展, 各种思想观念相互交织, 国内产业转型升级对劳动者素养提出了新要求, 新时代职业道德建设凝聚共识的难度加大。面对新的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 新时代职业道德建设肩负着服务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使命, 需要从社会主要矛盾变化、新一轮科技革命、中国式现代化三个方面来理解和把握, 应着力在制度建设、方式创新、作风引领三个方面探索实践进路, 不断推动新时代职业道德建设迈上新台阶。

**[关键词]** 新时代 职业道德建设 多维审视

**[中图分类号]** D648.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192X(2026)02-0058-07

DOI:10.16075/j.cnki.cn31-1220/g4.2026.02.010

新时代职业道德建设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基石。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职业行为层面的具体体现, 加强新时代职业道德建设是提升国家治理效能的内在要求。党的十八大以来, 党中央高度重视职业道德建设, 习近平总书记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 为新时代职业道德建设提供了科学指引和根本遵循。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浪潮和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要求, 新时代职业道德建设要在马克思主义道德观的基础上,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关注新时代职业道德领域面临的新变化, 深刻理解新时代职业道德建设的内涵, 把握新时代职业道德建设的实践要求, 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注入强大的道德力量。

## 一、新时代职业道德建设的逻辑理路

职业道德建设在整个精神文明建设中占据着重

要地位, 是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环节。随着国内产业结构的升级和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 新时代职业道德建设面临新的挑战。在马克思主义道德观的基础上, 分析研判新时代职业道德建设面临的新情况新形势, 尤其是当下职业道德领域出现的新问题, 对理解和把握新时代职业道德建设的内涵具有重要意义。

### 1. 新时代职业道德建设的理论基础

马克思主义认为:“宗教、家庭、国家、法、道德、科学、艺术等等, 都不过是生产的一些特殊的方式, 并且受生产的普遍规律的支配。”<sup>[1]</sup>道德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 归根结底来源于人在实践中的社会关系和生活条件, “从现实的前提出发, 它一刻也不离开这种前提。它的前提是人, 但不是处在某种虚幻的离群索居和固定不变状态中的人, 而是处在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的发展过程中的人”。<sup>[2]</sup>道德并不是超越现实的空洞规范, 真正的道德应该建立在“现实的

**[作者简介]** 邢国忠, 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马克思主义人民观及当代阐释研究”(项目批准号: 24AZD036)。

人”的基础之上，是在一定历史条件和社会实践中形成、变化和发展的价值规范体系。在阶级社会中，道德本质上是为特定阶级的利益服务的意识形态。<sup>[3]</sup>因此，新时代职业道德建设必须坚持以唯物史观为指导，认识到职业道德的发展变化最终由社会存在决定，其目标是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逐步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一理论逻辑为认识新时代职业道德建设的历史性、社会性和阶级性提供了根本的思想基础。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就道德建设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创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道德观，为新时代职业道德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sup>[4]</sup>将道德建设提升到关系国家兴衰和个人立身之本的战略高度，强调建设高素质劳动者大军必须把“德”摆在首位，凸显了新时代职业道德建设的极端重要性，其核心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导向，强调道德建设必须体现人民性，以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这要求各行各业的从业者要将个人职业发展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恪守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此外，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时代中国青年要自觉树立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善于从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中汲取道德滋养。”<sup>[5]</sup>《新时代职业道德建设实施纲要》也指出，传承弘扬我国人民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传统美德，结合时代要求推动其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这些新要求把握了新时代的特征，在自觉传承“敬业乐群”、“克己奉公”等中华传统美德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式现代化的新任务、新特点，对其内涵和形式进行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使新时代职业道德建设焕发新的生机与活力。

## 2. 新时代职业道德建设面临的新情况新形势

当前我国经济正处在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社会组织结构、物质利益形态趋向多样化，利益格局深刻调整，职业道德建设的空间环境、时代任务、内容指向等也在逐渐改变。

从内部环境来看，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深入发展，我国产业正经历由资源密集型、劳动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智能化和服务型经济的深度转型，这

一趋势对职业素养和职业道德都提出了全新的要求。在职业素养方面，过去以执行为主的岗位逐渐被需要具备数字技术应用、跨界协同与持续学习能力的复合型岗位所取代，尤其是在智能制造、平台经济等领域对创新思维和问题解决能力的重视程度不断提升。同时，随着产业结构的升级，职业道德建设也面临新的挑战。从数据安全到算法伦理，从平台责任到公平交易，在新的职业环境中技术与责任往往并行不悖，这就要求从业者不仅要具备专业能力，更要有清晰的道德判断和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在这样的背景下，要建立与之相匹配的职业教育与培训体系，推动技术能力与道德意识的协同培养，共同营造和谐向善的职业道德环境。

从外部环境来看，跨境电商、数字营销等对职业道德的国际标准和规范提出了更高要求；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的广泛应用，改变了传统职业形态；全球面临气候变化、资源短缺等挑战，要求职业道德融入可持续发展理念。在国际战略竞争日益加剧的背景下，加强新时代职业道德建设构成了维护国家发展安全与提升文化软实力的关键环节。这一命题的紧迫性基于以下三个层面的考量：首先，在意识形态层面，西方价值体系的持续性渗透对我国主流价值认同形成解构性压力，亟须通过道德建设强化价值认同的整合机制；其次，在社会治理层面，实现核心技术突破与产业转型升级需要培育具有奉献精神与创新意识的职业伦理，这要求构建与之相匹配的道德规范体系；最后，在全球治理层面，道德建设关乎国家形象塑造与国际话语权争夺，成熟的道德范式能够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提供合法性支撑。因此，新时代职业道德建设已超越传统伦理范畴，成为关乎国家核心竞争力培育的战略性工程。

人工智能等新兴科技不断重塑职业道德治理形态。面对新技术带来的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新时代职业道德建设肩负着服务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使命，这要求新时代职业道德建设必须观照国情世情、群众需要而作出适恰的革新应对。要特别注重加强职业道德教育，帮助人们尤其是年轻人认识他们所从事的职业的社会价值，培养他们热爱本职工

作的情感和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推动新时代职业道德建设健康发展。

### 3. 新时代职业道德领域面临的突出问题

在社会生活中,“实际上,每一个阶级,甚至每一个行业,都各有各的道德”。<sup>[6]</sup>职业道德是国民在职业活动领域根据事业需要、个体发展等要求所应遵循的道德规范,是对从业人员的职业观念、纪律和作风等问题作出的具体规定。社会主义社会的职业道德是人类历史上职业道德发展的新阶段,它把从事各种职业的人的利益同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有机结合起来,使职业利益服从人民的利益,从而使职业道德在调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发挥着重要作用。<sup>[7]</sup>新时代职业道德建设旨在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熔铸于职业活动的规范之中,使劳动者在日常实践中将其内化于心、外化于行。职业道德建设就是要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机融入各行各业的职业活动与伦理结构中,推动价值理念转化为自觉的职业行为与制度化的实践机制。

“这个公正的旁观者,既不会因为看到自己观察其行动的人们的当前的劳累而感到筋疲力尽,也不会因为看到他们对当前一些欲望的缠绕不休的呼喊而受到诱惑。”<sup>[8]</sup>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的这句话赞赏那种为了更持久、更重大的未来利益而克制当下欲望的远见。这对扭转当前某些领域急功近利的职业风气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当前,职业道德领域的突出问题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社会各个领域共有的道德问题。比如,受“熟人社会”的思维模式影响,一些从业人员习惯性将人情关系带入工作,导致公私不分、随意越界、投机取巧等行为发生。另一类是某一领域特有的道德问题。<sup>[9]</sup>比如,贪污腐败、权钱交易、弄虚作假等官场道德问题,对社会风气产生较大的负面影响;部分企业和从业人员不讲诚信,存在制售假冒伪劣产品、虚假宣传、借贷不还、利用大数据“杀熟”等商业领域的道德问题;等等。现代化发展过程中催生了许多新问题,需要根据时代的新变化推动职业道德的完善与发展。因此,审视新时代职业变化的社会伦理基础,考察职业道德践行过程中的要点和难点,是新时代职业道德建设的当务之急。

## 二、新时代职业道德建设的多维审视

道德建设历来是中国共产党非常重视的一项工作。进入新时代以来,我国职业道德建设取得了显著成绩,呈现出积极向上的良好态势,但在复杂多变的社会环境中,新时代职业道德建设需要从社会主要矛盾变化、新一轮科技革命、中国式现代化三个方面来理解和把握。

### 1. 社会主要矛盾转变推动新时代职业道德建设向精神文明纵深发展

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原理,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必然引起人们道德观念的变化。随着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职业道德建设也被赋予了新时代的新使命。这一矛盾意味着,人民不仅仅满足于物质层面的就业与收入保障,更追求公平正义、尊严感、信任感与高质量的职业体验。而在现实中,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表现之一,正是各行业职业道德水平参差不齐,一些行业重经济效益、轻道德约束,缺乏战略眼光,责任缺位,导致公众信任缺失与社会心理焦虑。加强职业道德教育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要通过选树榜样、培育典型的职业道德模范来营造知荣辱、促和谐的社会氛围,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外化为从业者的道德实践。必须推动各行各业建立健全行业道德规范和职业操守红线,构建公平、透明、有温度的行业文化,尤其要在新兴行业、灵活就业群体中弥补制度性“道德真空”。职业道德建设归根结底是做人的工作,是作用于人的思想、精神、灵魂的宏大工程,如在医疗、教育等公共服务行业,“医者仁心”、“教书育人”的人文关怀成为衡量职业价值的核心维度,以实现职业与道德的有机统一。与此同时,这一矛盾也反映在个体层面的心理预期提升与道德自律滞后之间的错位。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已超越物质层面,延伸到对更有尊严、更具创造性的劳动体验的精神渴求。传统的制度约束虽能确保职业行为的基本规范,却难以回应劳动者在主体性觉醒、价值实现等

方面的高层次需要。因此,新时代职业道德建设不能仅停留在制度约束和被动遵守层面,更应转向健康向上的文化价值观、积极进取的工作作风、乐观开朗的生活态度、善良礼貌的交往方式、朝气蓬勃的情绪心理、胸怀天下的人文情怀,引导劳动者将职业视为实现人生价值和服务社会的载体,主动提升责任意识、服务意识与专业精神。劳动者唯有实现从“要我遵守”到“我要担当”的转变,职业道德建设才能真正从外部规训走向内在信仰,进而推动精神文明建设向纵深发展。

## 2. 新一轮科技革命重构新时代职业生态和伦理范式

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演进,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等新技术新应用新业态方兴未艾,互联网迎来了更加强劲的发展动能和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发展好、运用好、治理好互联网,让互联网更好造福人类,是国际社会的共同责任,各国应顺应时代潮流,勇担发展责任,共迎风险挑战。<sup>[10]</sup>以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物联网等前沿技术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不仅深刻改变了生产方式和组织形态,更对职业生态系统与伦理规范提出了重构的要求。这种重构体现在三个层面:一是职业结构的重塑,大量传统职业被取代,新职业不断涌现,如算法工程师、数据分析师、数字孪生设计师等职业成为新常态;二是劳动关系的变化,平台经济催生了自由职业者、零工劳动者等新型就业形式,雇佣关系趋于去中心化和碎片化;三是评价标准与职业价值的转向,从以岗位稳定性、权力等级为核心的职业评价体系,逐步转向以创造力、数字技能、社会影响力等为导向的多元价值体系。在此背景下,职业生态正从工业时代“科层化、稳定型”的结构转向“平台化、流动型”的新生态。例如,互联网平台调动起了大量的社会资源,基于平台经济衍生的零工经济、弹性积累和大数据精准营销,使很多传统行业被重构,也引起各个行业的不适应。随之而来的是职业伦理范式的深刻变革。以往强调职责、服从、稳定的工业伦理,正在被合作、透明、灵活所取代。例如,AI伦理呼吁程序员必须承担矫正算法偏见的社会责任,教

师需审慎处理数据使用的边界,平台公司要明确对零工劳动者的保障责任。伦理议题不再是末端的制度补丁,而成为科技介入职业场景前必须设定的原则性前提。因此,新一轮科技革命带来了职业生态的系统性裂变,也推动伦理范式从规范型、约束型向前置型、参与型、责任型转变。从业者不再仅仅是被动地适应岗位要求,更需要在新技术与新伦理交织的环境中,主动重构自身的道德认知与专业价值,实现技术进步与人文精神的动态平衡。此外,数字技术使资本的运作方式、统治技艺和剥削手段更加虚拟迷幻,资本逐利从物质生产蔓延至精神领域,在资本逻辑规训下的生产深受资本逻辑浸染,异化为资本增殖的手段。例如,网络平台沦为资本牟利的空间站,由于主播素质欠佳、监管缺失,许多知名博主和“网红”直播带货频频“翻车”,网络平台从业者被资本逻辑和技术逻辑所裹挟,沦为资本增殖的牺牲品,加剧职业道德领域的认知偏狭。

## 3. 中国式现代化赋予新时代职业道德建设新内涵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sup>[11]</sup>当前,我国正处于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关键时期,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成为重要目标。在社会治理实践中,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等建设已提上日程。在推进现代化强国建设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中,将道德建设置于国家治理现代化视域加以讨论具有重要意义。<sup>[12]</sup>新时代职业道德建设不再仅仅是行业自律问题,而是关系到中国式现代化全局的战略性问题,这种定位变化促使各行各业要把职业道德建设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系统推进、整体落实。

职业道德建设具有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特点,是行动中的道德,是道德原则、规范同行动的结合,是知与行的统一。随着中国式现代化的深入推进,新业态、新职业不断涌现,职业道德建设将从传统行业扩展到新兴领域。特别是在数字技术迅速发展、职业形态日益多元的今天,职业道德的时代内涵也在不断丰富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为职业道德建设赋予了新的时代内涵,使其具有了新的深度

和广度。一是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导向。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这要求新时代职业道德建设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将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职业活动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在此过程中，“工匠精神”所蕴含的执着专注、精益求精，“教育家精神”所倡导的“心有大我、至诚报国”的理想信念和“乐教爱生、甘于奉献”的仁爱之心被有机融入职业道德规范。这些精神元素共同构筑了新时代职业道德的价值底座，引导从业者在职活动中超越个人利益，心系国家发展和人民福祉，将职业发展的“小我”融入强国建设的“大我”之中，体现了奉献社会的深厚情怀。二是全面协调发展的目标追求。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要求职业道德建设致力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职业活动不仅是专业技能的施展，更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过程，需要职业道德的托举和升华。“教育家精神”中“启智润心、因材施教”的育人智慧和“勤学笃行、求是创新”的躬耕态度，为这一目标追求提供了具体路径。它要求从业者不仅要精进技艺，像“大国工匠”那样“执着专注、精益求精、一丝不苟、追求卓越”，更要在职业发展中实现专业技能与道德素养的平衡统一，最终达到知行合一的境界。三是兼容传统与现代的文化底蕴。从“敬事而信”到“鞠躬尽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着丰富的职业道德思想，中国式现代化深深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要求新时代职业道德建设要善于从中华传统美德中汲取营养。“教育家精神”强调“言为士则、行为世范”的道德情操和“胸怀天下、以文化人”的弘道追求，而“大国工匠”的实践则展现了现代工业文明中的职业伦理，这种融合使职业道德建设既承续千年文脉，又激荡“强国有我”的时代强音，为新时代职业道德建设提供了丰沃土壤。

### 三、推进新时代职业道德建设的路径

新时代职业道德建设必须根植于中国式现代化实践，承接中华民族传统美德，这样所建立的道德

体系才具有民族性和渗透力。在把握新时代职业道德内涵的基础上，以促进全社会文明程度不断提升为目标，着力在制度建设、方式创新、作风引领三个方面探索实践进路，不断推动新时代职业道德建设迈上新的台阶。

#### 1. 统筹顶层设计与执行保障，注重新时代职业道德建设与治理的制度建设

新时代职业道德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涉及许多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复杂性、艰巨性前所未有，顶层设计不可或缺。面对这些交织叠加的难题，顶层设计需要以“系统集成、协同高效”为原则，构建“立法—执法—监督—教育”四位一体的治理框架：在立法层面推动专项立法，明确各职业道德底线与问责条款；在执法层面建立跨部门联合惩戒机制，对金融欺诈、学术造假等失德行为实施黑名单制度；在监督层面引入第三方评估与公众参与，如医疗行业患者满意度动态监测、教育领域师德师风社会评议；在教育层面深化课程改革，将医德、师德、商德等纳入高校通识教育与在职培训核心模块。唯有通过这种全局性、战略性的顶层设计，才能实现从“被动应对”到“主动引领”的转型，推动新时代职业道德建设与经济社会发展同频共振，构建起既符合中国国情又具有国际视野的现代职业伦理体系。

推动新时代职业道德建设与治理，必须统筹价值引领与制度保障。价值引领侧重于培育内在道德自觉，通过弘扬“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开展职业楷模评选、职业道德培训等活动，如“全国道德模范”评选中的“敬业奉献”典型，激发从业者向上向善的内生动力。制度保障则强化刚性约束，通过制定《职业道德行为准则》行业细则，如金融领域“利益冲突披露”强制申报制度、医疗领域知情同意操作规范量化标准，以及建立“黑名单”制度与诚信档案动态管理，对失德行为实施一处失德、处处受限的惩戒。通过价值引领解决“不愿失德”的道德自觉问题，通过制度保障解决“不敢失德、不能失德”的规则约束问题，实现二者的功能互补；通过道德教育提升制度执行的文化认同，如“医者仁心”理念使医疗领

域的监督机制更易被接受,通过刚性约束强化价值引领的实际效果,如教师“师德积分制”将师德表现与职称评定挂钩,使立德树人的价值要求转化为可量化的执行标准。统筹好价值引领和制度保障,构建起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的职业道德治理生态,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道德支撑。

在新时代职业道德建设中,制度建设与监督评价二者互为支撑、缺一不可。职业监督需要构建多元协同、全流程覆盖的监督体系,重点解决“谁来监督、怎么监督、如何评价”三大问题,形成“规则明晰、执行有力、失德必究”的治理闭环。在监督主体层面,政府应明确各行业禁止性行为及问责标准;社会公众通过举报平台、媒体曝光参与监督,形成外部压力。在监督流程层面,需要开展“事前—事中—事后”全链条管理,事前通过职业准入考试、岗前培训强化道德门槛,事中运用大数据、区块链技术实时监测异常行为,事后建立黑名单制度与信用修复机制,对失德者实施从业限制,对改过者给予信用修复机会。在监督评价层面,采用定量指标与定性指标相结合的立体化监督体系,既能解决监督缺口问题,又能避免过度监督风险,最终为新时代职业道德建设提供坚实保障,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 2. 强化教育引导关键路径,注重新时代职业道德建设与治理的改革创新

深化职业道德教育引导需要以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为价值坐标,重构教育内容体系。在新时代职业道德建设中,只有从道德建设的广泛性出发,也就是从各行各业从业者的实际道德水平出发,用教育激励的手段,使他们的职业活动同为人民服务的要求结合起来。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背景下,职业道德教育不能仅局限于传统职业规范,而应纳入高质量发展要求、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等与国家战略直接关联的内容。例如,在高校课程中增设“中国式现代化与职业伦理”模块,通过分析科技创新中的工匠精神、乡村振兴中的服务基层理念、共同富裕背景下的公平交易案例等议题,引导学生理解职业行为对国家现代化进程的深远影响;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中的“敬业乐群”、“义利兼顾”等道德要求与当代劳模精神、创新精神相结合,通过实践案例提炼符合中国式现代化要求的职业道德准则,使教育内容既体现文化传承又具有时代特色,培养自觉服务于民族复兴伟业的职业人才。

教育方法的革新是深化职业道德教育引导的关键路径。传统单向灌输式教育已难以适应新时代道德教育的要求,需要探索沉浸式、参与式教学模式。例如,通过企业实习项目,让学生真实体验职业道德行为对企业的影响;开展模拟国际组织道德辩论,培养学生解决全球伦理困境的能力;运用VR技术构建数字伦理实验室,模拟数据隐私泄露、算法歧视等场景,引导学习者在虚拟实践中认识技术伦理边界。此外,通过师徒制、导师制引入行业道德榜样,以真实案例传递“利他共荣”的职业价值观,使教育过程从知识传递升华为价值引领。

教育载体的拓展需要构建“学校—企业—社会—网络”四位一体的立体化格局。在学校层面,除了专业课程,还可通过职业伦理论坛、跨文明职业培训等第二课堂活动深化道德实践;在企业层面,推动建立全球合规培训体系,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融入跨国企业运营中;在社会层面,通过公益广告、社区讲座、媒体宣传等弘扬劳动模范事迹,营造崇尚道德的职业文化氛围;在网络层面,开发职业伦理慕课平台,整合优质教育资源,构建“无边界”的职业道德学习共同体。这种多维载体联动使职业道德教育从课堂延伸至社会,从个体扩展至全球,真正实现从教育引导向道德共建的转化。

## 3. 坚持以党风引领政风民风,注重新时代职业道德建设与治理的示范带动

党员干部以守公德、严私德的实践引领职业道德建设,是新时代夯实职业道德基础的核心抓手。对于任何一个社会来说,统治阶级的职业道德都对整个社会的职业道德有着特别重要的影响。也就是说,国家各级领导干部的职业道德尤其是党员领导干部的职业道德对整个社会风气有决定性的影响。官德建设是民德建设之本,“官德隆,民德昌;官德毁,民德降”。<sup>[13]</sup>如果每个党员领导干部都能自觉遵守职业道德,就会对普通群众产生积极的示范

引领作用,进而形成新时代道德建设的合力。作为社会治理的“关键少数”,党员领导干部的道德选择具有强烈的示范效应,能影响和塑造群众对公权力的信任,引导社会道德风向。这种示范能激发群众的向善意识,推动形成“人人讲道德、事事守规范”的良好社会风尚,最终实现“党员干部带头、群众积极参与”的职业道德建设格局,为新时代社会道德水平提升提供坚实支撑。

要发挥文化浸润与价值引导的深层力量,实现道德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的自觉转化。党员领导干部的示范引领若仅依靠外部约束,难以形成持久的生命力,必须通过文化熏陶和价值认同激发内在动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价值序列,以及革命文化中“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精神基因,为新时代道德建设提供了丰厚土壤。通过持续开展廉洁文化教育、家风建设活动,将“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的要求融入党员领导干部的日常修养中,使其在潜移默化中筑牢拒腐防变的思想防线。同时,要注重将抽象的道德规范转化为可感知、可践行的价值导向,如倡导“小事立德”的实践理念,引导党员领导干部从工作细节、生活点滴中锤炼党性,在公私界限、义利关系上保持清醒认识。这种以文化人、以德润心的方式,能够推动职业道德从外在规范转化为内在追求,形成“无须扬鞭自奋蹄”的道德自觉。

要深刻把握以党风引领政风民风的系统性、长期性特征,构建多元主体协同共治的道德建设生态。在新时代背景下,社会道德建设已成为与社会治理、公共服务、法治建设等深度融合的系统工程。党风、政风、民风三者相互交织、彼此影响,构成动态发展的有机整体。党员领导干部的示范效应要与群众参与形成良性互动,才能真正凝聚道德共识。一方面,要激发人民群众在道德建设中的主体作用,通过畅通监督渠道、搭建参与平台,鼓励群众对党员领导干部的作风进行评价反馈,使道德建设成为双向互动的过程。另一方面,要推动道德建设融入基层治理、公共服务等多元场景,如通过“小事劝善”、“微光行动”等载体,将道德要求转化为社会成员日常的行为准则,形成“人人参与、人

人共享”的治理格局。党员领导干部的模范行为不仅能提升公共政策的公信力和执行力,更能有效降低社会治理成本,增强社会凝聚力和认同。当每一位党员都成为道德实践的鲜活载体,便可汇聚成强大的教化力量,实现德治与法治相得益彰,共同筑牢社会和谐的基石。因此,坚持党风引领,强化道德建设的示范带动,绝非一时之策,而是实现社会善治、夯实党长期执政根基的战略之举,必将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注入深沉而持久的道德力量。

#### 参考文献:

-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298.
- [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153.
- [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471.
- [4]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168.
- [5] 习近平.论党的青年工作[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2:213.
- [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40.
- [7] 罗国杰.社会主义道德体系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229.
- [8] [英] 亚当·斯密.道德情操论[M].译者:蒋自强等.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277.
- [9] 余玉花,孙婉君.关于协同治理道德领域突出问题的若干思考[J].思想理论教育,2025(1).
- [10] 习近平关于网络强国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168.
- [11]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N].人民日报,2022-10-26.
- [12] 付洪,舒高磊,朱雪微等.国家治理中的道德建设[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7.
- [13] 罗国杰.伦理学探索之路[M].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285.